

水和书,轻和重

■翁德汉

我在温州平原中间地带半山腰长大,家家户户门后有水井。我家水井不出水,倒积了不少,却都是地表水,不久会发臭,毫无用处,父亲只在磨刀时荡一下。我家门后无泉眼,打不出水,偏偏隔壁和上下邻居家都有水井,我们吃水需要去挑。

年少时的记忆里,挑水占了大头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就挑上水了。家里有水桶,备着一根适合我的肩膀的竹扁担,水缸里的水用得差不多了,我挑着空水桶从邻居家侧边小路而过。去时很近,回时很远,只因小小的肩膀上是大大的心思,满满的水让来时路看起来远了不少。

那时候的水一点也不重,重的是番薯和稻谷。水井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水,四季不停。番薯一年成熟一次,稻谷一年收割两次,还是不够我们家一日三餐消耗。

兜兜转转四十余年后,我在吹台山下圈了小块地,种上包菜、白菜和花菜等蔬菜,丝瓜、冬瓜和蒲瓜等瓜果。无论是秋季时的前者,还是夏天时的后者,均需水源加持。住在小区里,我无意准备扁担,只用双手去提水桶。一直觉得农民出身的自己,对付水和水桶是手到擒来的事情。我忘记时光已消磨掉身上的印记,提着提着,手腕抱怨起来,隐隐作痛。某天水桶一抄溪水猛地提起,第二天手腕反应尤其强烈,后悔不迭。我每天拿筋膜枪在手腕处按摩,企图消灭疼痛带来的惆怅。边用筋膜

枪,我心里边想着:“水真重!”

在我的生活中,水重,书也重。

去图书馆借书,一次可以借十五本,期限一个月。我的怀抱太小,十五本书抱不住,遂请布袋帮忙。有意无意中发现,十五本书装在布袋里刚刚好。布袋挺牢固,毫无怨言,一声不吭地抱着一堆书。布袋和我之间,由双手连接着。布袋不疼,我的手腕意见可大了,抱怨总是把压力给它。

这才十五本,搬家时需要移动的是几千本书。前几年多次搬家,其中一次搬家公司人员来踩路看到这么多书,直接摇摇头走了。最后一次,我采用蚂蚁搬家方式,一个软塑料条编织的大篮子装一两袋书放车上,去新家看装修时送过去。篮子两边各有提手,装满后双手提起,从楼上一步一步移下来。手腕受力大,手指勒得紧,依然在承受的范围之内。新家还未住进去,我的书已搬迁完毕,手之痛在记忆里缩写成“搬书”两字。

于我而言,水和书之外已无其它重物,它们是看得见的重,却是看不见的轻。它们是生活之重,是生命之轻,绝不是失眠的源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,村里木工阿叔接了个活,某学校扩招请他在开学前做一定数量的课桌和椅子。他计算了一下,需要日夜不休才能把活干完,但他毅然接了,因为利润高,抵得上他平常两年的收入。在他家道坦里搭了个棚,日夜做木

工,我清晨上学、日暮放学经过他家门前,都能听见木头被修理的声音。日夜操劳,终于在开学前交货。课桌是重的,椅子是重的,木头也是重物,但在阿叔眼里都是轻的。他说他心里千斤重,大儿子手脚残疾且不会说话,下面还有三个孩子,他总得把他们养大。尤其是大儿子,他需要养一辈子。

国庆前夕,早上六点在早餐店里吃早餐,边上一男子特别兴奋,说自己国庆期间有事情干了,荷包能增加两叠。我一听就明白,两叠是两万,七天纯挣两万,怪不得这么高兴。有人说:“别人放假,你干活。”男子说:“有钱挣,还放什么假。”是啊,被轻轻的重担压着的芸芸众生,谁不想轻松点呢?

轻轻的重,看不见的重,才是真的重。捷克作家米兰·昆德拉有部小说叫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,曾经风靡一时,探讨了生命中轻与重的问题。他认为“生命的重量在于其意义和责任,而‘轻’则意味着缺乏意义和责任”。

我们在办理银行贷款时只需要在一张纸上签下名字。这张纸拿在手上毫无重量,压在心里重如山,你说它是轻还是重?

家长提孩子的书包不重,双休日来回接送去上各类培训班,“望子成龙”这四个字是轻还是重?

每年体检一次,拿到体检报告单时,这轻轻的几张纸,它是轻还是重?

裁缝匠

■王乐天

小时候,一到寒冬腊月,孩子们特别期盼过年,在他们眼中,过年就意味着能穿上新衣,一个家庭即使再怎么拮据,父母都会想方设法给孩子做套衣服过新年,图个吉利喜庆。在我的少年印象中,乡亲们所穿的衣服很少是买的成品,大多是去裁缝铺里定制,也有个别会请裁缝师傅上门制作。当时,服装量体、裁剪、缝纫、熨烫、试样诸工序,都是独立完成,以此谋生者,被乡亲们呢称为“裁缝匠”。

过去,裁缝匠这门手艺很吃香,在乡亲们眼里,是斯文、手巧、有技艺的能人,与其它众多传统手艺人相比,裁缝活干净、体面,而且轻松,不用日晒雨淋,可以足不出户地在屋里干活,学这门手艺的人很多。同时,裁缝匠也与乡亲们的生活最为贴近,凡是婚丧嫁娶或新生儿降生,都离不开它。当时,家里不论是谁的衣服有了破绽,或是纽扣丢了,或是拉链坏了……家中一切必不可少的针头线脑之事,几乎都要往裁缝铺里跑。裁缝铺平常也是妇女和女孩子最爱逗留的地方,那些裁剪下来的零星碎布,她们捡了可以去缝补衣服或粘贴鞋样,或纳布鞋底,或纳鞋垫等。

记忆中的老家曾分布着好几家裁缝铺,但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位于南门街上的一家裁缝铺。店铺由夫妻俩共同经营,男的系本地人,女的来自台州黄岩,讲着一口比较拗口的普通话。她家的几个孩子先后就读于红星小学,上学期间,母亲就曾担任过他们的班主任。母亲常常带着我去她家,于我而言,他家的裁缝铺是一家趣味无穷的手工作坊。每次去,阿姨待我很热情,总会拿出许许多多的糖果来招待,并热心地张罗着为母亲做衣服。

说是裁缝铺,其实不过是一间狭长的面街店面而已,处在一家五金店与白水乡供销社副食品分部中间,坐南朝北,面对着狭窄的南门河,商住两用,一楼为店铺,二楼为住房。店铺前屋的右边,铺着一块长长的案板,案板上放置着剪刀、软皮尺、画粉、熨斗、线团等标配,由于长时间磨擦,木案板已显得光滑油亮。墙壁的挂钩上悬满了布匹和成衣。左边进门处一前一后安放两台缝纫机。机头下系琥珀色的台面,台面下面有个踏板,一根皮带和缝纫机机头相连,用脚踩下面的踏板,踏板就带动轮子转动起来。通往一楼后屋的过道显得逼仄促狭,往里走必须得侧身才能勉强通行。裁缝铺的后屋为厨房,从前屋登梯而上为两屋卧室。

一进裁缝铺,总是散发出缝纫机油好闻的气味,常见男师傅将笨拙的老式铁熨斗抓在手里,在布料上梭过来梭过去。在那个循规蹈矩、缺衣少食的七八十年代,成衣服装店寥若星辰,也绝少有人到服装店去购买成衣。节俭成了乡亲们潜意识的生活行为,平时孩子们总是习以为常地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。补丁,是我对衣服认知的重要部分。那时我们的衣服上都有几块补丁,或者膝盖上,或者拐肘处。补丁大小不一,布料质地有别,颜色或深或浅。那些补丁记录着我们的顽皮以及母亲的叮咛。一年之中,只有每年腊月,大多数人家才凭票证去供销社,扯来各

色质地和花样的新布匹,然后带家人到裁缝铺进行量体裁衣。因为穿新衣是最外在、最直观的过年仪式,也是最隆重、最丰厚的过年内容。

裁缝干活时全凭手工,靠一针一线完成所有工序。裁缝不仅是技术活,更是一种艺术活。男师傅的软皮尺往顾客的肩、臂、胸围、腿、肘、脖子等“测量数据”,左一拉右一扯游走,嘴里念叨:“站直了,挺胸,昂头!”便一清二楚,成竹在胸。在我的印象中,男师傅心地善良,处处能为顾客着想,一块布料有时要反复丈量身高、肩宽、袖长、腰围,目的是节省布料,连布边角都能派上用场,用于做鞋帮或打布片壳。给小孩缝制的衣服,尺寸上都放得宽一些,因为身高在长,今年穿了明年还可以穿,裤脚边留得长,长高了可放边继续穿。量体后,师傅便随手在纸上或布料上记下旁人看不懂的符号和数字,并拿出一个蔫巴巴的本子,在上面记录下顾客的姓名和上门取衣的日期。

与其它店铺一年四季的车水马龙相比,裁缝铺的生意明显带有季节性,裁缝活时多时少,并不稳定,而每年将近年关时则是裁缝铺生意最为繁忙的日子:老老少少从头到脚的新衣需提前定做,这要耐心排队等候。夫妻俩就在房间里一直忙得不可开交,有时得通宵达旦进行赶制。他们分工明确,各司其职,男人担纲剪裁,他将布匹摊在与腰部齐高的长长的案板上,捏着粉色的划粉划划改改,并用尺子飞速打版,嘴里还不时自言自语,然后开始“咔嚓咔嚓”地裁剪着布料。女人则围着围裙,戴着袖套,娴熟而默契地蹬着缝纫机的踏板缝制衣服。她先轻轻用手挪动机头转轮,然后踩动踏板,机头右下方的针尖便会像小鸡啄米似的不停地啄动,线梭在机顶上顺时针旋转,针下的布料便自然向后转动,她踩动缝纫机的踏板时非常有节奏感,“哒哒哒”的声音一直回荡在小屋里。

上高中后,我便很少光临这家裁缝铺了。工作后的一个寒假回家看望父母,听他们说,随着生意的衰落以及年纪增长的原因,这家裁缝铺歇业了,他们也搬迁到市区居住了。我曾随母亲去过他家位于上村路的房子,阿姨明显发福了很多,她待我们仍然十分热情,拉着母亲的手问长问短,说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,一直惦记着母亲对他们的教育之恩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,现代化的制衣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,各种新潮服饰开始装点着城市商场和乡村店铺,之后,网络销售的异军突起,使人们的选择方式更加多元化,购买衣服既方便又省事。由此,乡村裁缝匠这个行业已是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,生意越来越惨淡,实在难以为继,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不少裁缝店也纷纷改换门庭,陆续变身成时装店、私人定制店。只有个别年纪稍大的裁缝匠,在城市边缘的市场里,摆个缝纫机的摊位,替人扎线缝、裁裤边、换拉链,挣点加工费。如今,乡村裁缝匠挥动裁剪、舞动针线的身影以及“嗒嗒、嗒嗒”的机器转动声已渐行渐远,留下的只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们挥之不去的回味。



南湖新姿

王珏玮/摄

馄饨李

■郑育友

“笃笃……笃……”

馄饨担穿街走巷响起了卖馄饨的敲梆声。我听到这一声声敲梆声,不禁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,家乡馄饨李卖馄饨那些事儿。

馄饨李是我邻居,大名李天启。据李氏族谱载,他是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第十六世后裔,他为此深感自豪,常在别人面前夸说自己是李闯王正宗后裔。后来,因煮馄饨出了名,大家都管他叫“馄饨李”。

馄饨李家原住湖屿桥老街衙殿下边,今随开发“美丽”乡村,他下代已搬迁至东垟降新区居住了。

馄饨李对人恁和气,有人找上他的馄饨担煮馄饨,他会站你身边,细声软语地问长问短。“馄饨是否煮得太咸一点?要不要添点辣的榨菜?”又不论哪个人吃好吃馄饨要回去,他会拱

手喊道:“走好,走好!”

我夜里买他馄饨吃,是十岁那年。一个腊月天,风雪漫天飞舞的晚上,我正坐在小桌子上抄写生字,忽然听到巷弄口传来敲梆声就跑出家门,借着桅灯的光亮,高喊:“馄饨李,馄饨烧一碗!”

我到巷口一看,馄饨担周围挤满了男女老少,大家愁买不到馄饨,都喊开了:“我来得早,快煮碗给我!”

馄饨李的馄饨担是竹子制的,左首装铁锅,右首装抽屉与佐料,当中串着一条扁担。因卖馄饨是担贩,生意流动,不用租金,不备凳与桌子,哪里有生意他就往哪里跑,这馄饨担一刻也没离开他肩膀。

馄饨李听叫卖声恁闹热,就理手开张做生意。他一边烧汤,一边风趣地念道:“阿姨阿妈汪

勿慌,一个一个轮到煮。”乡亲见馄饨李讲话恁活稽生意恁忙,也就耐心等待。

馄饨李煮馄饨很理手,随手拿来薄皮馄饨,然后陷入肉丝,再放入沸腾涌汤里,用锅盖一闷,撩起来放入粗瓷大碗里,紧接着放上佐料:虾皮、紫菜、榨菜及葱、状元红老酒。哦!一股清香可口的味道吸入鼻子,使人口水欲滴。

乡亲们买到馄饨后,因没凳桌,有的端着碗站着,有的在阶沿头席地而坐,他们在“哦哦”声中吃着那美味可口的馄饨。

大家都说馄饨李煮的馄饨清香可口名闻四乡八村,这一点也不夸张。老李所制馄饨皮薄、馅肉精鲜,再加佐料考究独特,又是清汤单碗煮,价格便宜,每碗只五角钱,乡亲们吃了个个拍手叫绝。